

张闻天：长征的“关键先生”（上）◆ 王煜

两个“三人团”的斗争

1900年，张闻天出生于今上海浦东南汇的一个殷实的农户家庭。他的名字取自《诗经》“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而他也正如这充满书香的名号一般，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被誉为“红色教授”的学者型人物。

五四运动爆发后，张闻天投身于学生运动，并开始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评介外国文学名著。1920年至1923年，他先后到日本东京、美国旧金山学习和工作。1925年6月，张闻天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

1931年2月回到上海后不久，他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33年初，张闻天随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中央苏区，他在“少共”等组织的工作里，与毛泽东逐渐熟悉起来。加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他们形成了一个“三人团”。这样的团队，用后来张闻天自己的话来评论：“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

“这三个人之所以聚到了一起，是因为他们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中央的军事政治策略有共识。”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专家、宣教处原处长徐国梁告诉记者。这个“三人团”在一起议论得最多的话题是当时党和军队里另一个“三人团”的决策，后者即博古、李德、周恩来，是当时最高权力机构的成员。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张、毛、王这三个人团常常在一起对博古、李德的单纯防御和逃跑主义策略提出尖锐的批评。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后，张闻天这“三人团”自然也走在一起。红军在湘江之战遭受沉重打击后，人数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在这样的危局下，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内部公开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出：在敌人已经

1935年1月，中国西南小城遵义。一栋两层砖木结构、通体用灰砖砌成、呈曲尺形的建筑里，十几个人在这里开会。

一个戴着眼镜、充满儒雅气质的人站起来发言，会场里立即变得不平静，随后开始了两派意见的激烈争论。在争论中，新的共识达成，新的领导产生。

后来，这次会议众所周知，它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长征中的关键转折点，更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那个引出争论的发言者，就是张闻天。他是促成这次会议成功召开并使其落实的第一主角，是当之无愧的“关键中的关键”。



■ 1947年张闻天在佳木斯市合江省委办公楼前

完全摸清我方意图的情况下，仍然机械地坚持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计划，这显然是错误的。

在红军到达湖南与贵州交界的通道县时，毛泽东找到张闻天谈话。当时随军长征的罗明去找毛泽东，站在门口等候时，不经意听到了二人的谈话内容。据他回忆，毛泽东明确向张闻天提出：不能再照原计划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应该改变方向，向当时敌人力量最薄弱的贵州进军。显然，二人的这次谈话是通道会议的一个重要背景。

而在通道会议上，毛的提议得到张闻天的带头支持，而有了后者的支持，才避免了重

演长征前他对第五次反“围剿”提出过不少正确意见，却都没有被采纳的情况。周恩来、朱德等人也赞同这个意见。经过激烈争论，最终在几天后的黎平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正式决定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

虽然有了黎平会议的决定，但博古、李德仍然不甘心认错，仍在时时找着机会，想让红军转向湘西。很显然，因为博、李二人仍然占据着军事指挥权，错误的领导很可能卷土重来，党和红军将遭灭顶之灾。在三人团里，王稼祥坦率地表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博古、李德轰下台。

47.写妈妈的作文

我咬着铅笔头，咬出一堆腻乎乎的肉屑，咬得嘴唇皮发黑，作文才开了个头：“我和别的同学不一样。下雨的时候，别的同学都有人来接，来送雨伞，但没有人到学校里来接我的，我只能淋着雨跑回家。因为我没

我娘死了，死了好几年了。”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写的。今天的电灯好像亮得特别刺眼。这盏四十支光的电灯一般不开的，除非有大事。对小皮匠来说，我做功课属于大事。以前广东嫂来说，要是为我们缝补衣裳，这盏四十支光的电灯也会开一下。小皮匠时刻注意广东嫂的动向，要是她在咬最后一件衣服的线头了，马上眼疾手快地换灯。唯一例外，就是那个大牙齿女人来的时候，家里灯火一片通明。平时，房间里永远是一支三瓦的荧光灯，绿莹莹的，还闪闪烁烁，像是妖怪在吐舌头。哪怕

吃饭的时候，哪怕小皮匠的那些小皮匠朋友来做客，都是这盏三瓦的荧光灯。即便是这样的光线，小皮匠要是收拾我，从来是指哪打哪，毫无误差。长期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我也练就了在黑暗中洞若观火明察秋毫的本事。有次很偶然，我在黑暗中照镜子，发现镜子里我的眼睛也是绿莹莹的。

记忆里，我娘的鼻子肉乎乎的，像一只大蒜头，当然，是最好看最匀称的那种大蒜头。我娘从来没有打过我，骂过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娘让我趴在她的膝盖上，为我掏耳朵。我娘一边掏耳朵，一边哼她家乡的小调，声音沙哑，很好听。这也是我娘最快乐的时候。我的耳朵大，耳孔深，耳朵多，让她掏得十分过瘾。她肯定觉得，儿子有这么大的两只耳朵，她将来笃定能享儿子的福了。我闭着眼睛，感觉到我娘的发夹在耳朵里摸摸索索地滑动，蹑手蹑脚地爬行，爬得我痒丝丝，麻酥酥的，舒服极了。等到翻过一面，挖另一只耳朵的时候，我基本上就睡着了。掏完耳朵，我娘直接把我抱到床上去睡觉。

有次广东嫂给我洗头，洗完了，她说：“你的耳朵里面太脏了，多久没掏过耳朵了？我来给你掏掏。”说罢从头上取下发夹，把我按倒在她的腿上。这个动作太熟悉太迷人了，

遵义会议的“第一主角”

1934年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张闻天、王稼祥当时都躺在担架上。行军途中，两人看到前方有一片茂密的橘林，就让人把自己抬进去休息。等旁边的人都走开后，两人头靠头，躺在各自的担架上。王稼祥问张闻天：“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说：“没有确定的目标。这仗这样打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

当天晚上，王稼祥就将张闻天的想法告诉了彭德怀，又告诉了毛泽东等人，话一传开，红军的高级将领都知道了这件事情。这样的说法由张闻天提出来，分量很重。在长征之前，他的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是当时公认的在地位上仅次于博古、李德三人团的人物。有了张闻天的这番话，很多人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当时的红军将领耿飚曾对张闻天此举如此评价：“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来，遵义会议就不可能开。他不提出来，也没有别人敢提。过去苏区多少同志因为提不同意见挨整呀。如果谁也不提，毛主席也出不来，我们红军就不可能胜利到达陕北，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发展。如果不是张闻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遵义会议就只能是按照黎平会议的决定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而不是从组织上让毛泽东进入常委参与军事指挥，问题还是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

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描述这个经典的故事时，称之为“担架上的‘阴谋’”。这个“阴谋”，正是挽救中国革命的关键事件。

红军占领遵义后，张闻天的三人团在一起商讨如何开好遵义会议。在毛泽东的主导下，他们商定了发言提纲。

有几秒钟的时间，我有点恍恍惚惚，以为我娘活过来了，我是趴在我娘的身上。我闭着眼睛，把脸贴得更紧一些，忽然闻到一股酒酿的气味，才猛地惊醒过来，赶紧逃开。

我还在发呆，听到小皮匠一声连一声地咳嗽，越咳越响，知道他心电电费，便胡乱地写了一通，第二天拿去交差。

第二天下午，第一节课就是语文课。顾老师抱着一摞作业本进教室，站在讲台前面。我们都规规矩矩地坐着，等着她讲话。这种时候，我总会目不转睛地盯着顾老师的脚看。顾老师爱光着脚穿布鞋，除了冬天，她基本上不穿袜子。黑布鞋上面横着一道搭襻，鞋檐和搭襻之间露出狭窄的脚背。顾老师的脚背很白很细腻，隐隐约约可以看到细细的淡蓝色的血管，脚背上面像是覆盖了一层糯米纸，闪着莹亮的光。我喜欢顾老师的脚。顾老师的脚是天底下最好看的脚。

今天顾老师的脚背好像有点肿，顾老师的肚皮好像也有点肿。我还发现顾老师的眼睛有点红。我那时候还不知道顾老师怀孕了，肚皮里有小孩子了。我顿时满腔愤怒。我们都知顾老师结婚了，老公是运输公司开十轮大卡车的，我们见过那家伙，脑袋圆兜兜的。我想一定是那家伙身在福中不知福，欺负了顾老师，必须找个机会教训教训他，把他的十只轮胎都戳破，还要用弹皮弓把那只圆兜兜的头打开花。那只圆兜兜的大头像轮胎一样很容易瞄准。

顾老师好像看出我的心思，目光注视着我。我费力地猜测，她目光里的意思究竟是鼓励还是责怪。我承认，我经常会把事情想歪。顾老师说话了：“我刚才批改了同学们的作文，同学们都很幸福，有一个疼爱你们的妈妈。同学们的作文写出了对妈妈的深厚感情，我看了很感动。我也有些不安，出这个作文题目，勾起了我班一位同学的伤心。你们也许都知道，在你们中间，有一位同学已经失去了妈妈。但恰恰是这位同学，写出了我们班最好的一篇作文。大家不要回头看，是的，这位同学是周大毛。我现在就把他的作文念给大家听。”

傅海澜传

董煜



29.尽快把司徒雷登救出来

最初的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司徒雷登和几百个海军陆战队员以及一些记者、传教士关在一起，除了食物质量差点，除了经常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监禁还是比较宽松的，在圣诞节那天，甚至还收到不少纪念品。

可是，不久的一天，所有被关押的美国人都被集中起来，听一个日本军官说过一番话后被释放，而司徒雷登和霍顿博士、斯拿珀尔博士以及财务主管特里维尔·鲍文，却被转移到霍顿博士家里，一座古老的类似满洲王府的住宅继续关押。4个月

后，斯拿珀尔博士被释放了，其余3人又被转移到一处英国商人的住宅里。看守他们的是7个卫兵，卫兵占了住宅的前院，也占用了唯一的一个厕所洗手间，司徒雷登等则住在后面狭窄的几个屋子里，当中是个约六米见方的院子，院子里铺着的水泥已经龟裂破碎，就在那里，司徒雷登和他的难友度过了他长达3年8个月零10天的监禁生活。

那天早上，傅泾波本来有机会离开日占区的。有位姓陈的燕大校友是个共产党员，他邀傅泾波跟他一块逃出日占区，连路线都已经安排好了。但自打日本宪兵闯进砖塔胡同，傅泾波就知道日本人一定不会放过司徒雷登，所以他断然拒绝独自离去。果然，下午便有人来报信，说司徒雷登已在天津被捕被押往北京。

燕大很多教师都已被捕，傅泾波跟司徒雷登关系那么密切，为什么能躲过一劫呢？因为日本人抓捕燕大师生时，是拿着燕大教职员工的名册一对号的，可那名册上并没有傅泾波的名字，所以日本人忽略了这个“编外人员”。但傅泾波知道，自己一直在日本人的监视之下，他拥有的只是暂时的自由。

顾不上自己的安危，傅泾波当时唯一的念头，就是尽快把司徒雷登救出来。他先联络了重庆方面的熟人，通过一个叫老刘的裁缝把消息传递出去，希望能够得到重庆方面的帮助。司徒雷登被转移到英国商人的住宅后，

他又通过关系跟八路军方面联系上了，并最终得到一个叫王凌的八路军地下工作者的允诺，答应帮助傅泾波前去劫狱。研究了司徒雷登被监禁院子的地理环境后，那个王凌拍着胸脯说，“不就是7个日本兵吗？我派一个小队就可以把司徒雷登救出来”。事情似乎很乐观，为了稳妥起见，傅泾波最后又去征询了时任国民政府代理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

说起这个王克敏，还真有段不为人知的故事。王克敏是杭州人，司徒雷登的老朋友，他的儿子也是燕大学生。1937年初，宋子文来北平，约见司徒雷登与傅泾波，在谈到日益严峻的北平时局时，宋子文提出，如果北平沦陷，不如先把王克敏推出来，让他对付日本人一阵。后来，三人约王克敏见了一次面，事情就这样拍板了。据司徒雷登说，这个“华北政府徒有其名的委员长王克敏，长期以来一直拿不定主意是否应当担任日本太君手下这一寡廉鲜耻的职务”，可见，当初王克敏当汉奸并不是情愿的，可是抗战胜利后王克敏还是以汉奸罪被捕入狱，最后死在狱中。此是后话了。

王克敏听了傅泾波的劫狱计划后竭力否定，他知道在西直门日本人有机关把守，既使把司徒雷登救出来也根本出不了城，“你想让机关枪把你们都扫死吗？”王克敏激动地说，“至少现在司徒雷登还没有生命之忧”。思去想来，最终，傅泾波只得放弃了这次有点冒失的劫狱行动。

司徒爷爷被囚禁，海澜是从父亲那里得知的，那天，父亲很严肃地对她和弟弟说，“你们放了学就回家，别到处乱跑，特别是海澜，你给我记住了”。海澜记住了，但没过几天，胡同里的男孩一叫，“傅小妹，北海溜冰去啦”，她又心痒痒地耐不住了，于是悄悄地把冰鞋放进书包，放学后直奔北海冰场。回来的时候经过大槐树，树下坐着歇息的几个洋车夫，老远见了海澜就使了个眼色让她过去，其中一个小声地对她说，“三姑娘，你别回家了，日本人在你家呢”。海澜吃了一惊，心里担心，更急着回家看个究竟。

大门破天荒地关着，海澜喊了好长时间，李春才过来开门，看见海澜，连声说，“你呀你呀，可回来了”。他一把把海澜拉进门，又赶紧把门关上。

同和里

王承志

